

卡尔·施穆科勒与苏联 MEGA¹ 编辑工作

〔土〕康加恩 / 徐家熠 译

内容提要 卡尔·施穆科勒(Karl Schmückle)是上世纪20年代从德国移民到苏联的参与 MEGA¹ 编辑的学者之一。作为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的成员之一,直至1931年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剧变发生前,施穆科勒都在大卫·梁赞诺夫的领导下从事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的编辑工作。施穆科勒参与编辑的作品包括1844年之前的著作、《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本文将介绍施穆科勒在德国和苏联的学术,重点探讨他对马克思早期著作的研究,据此展现他的理论抱负和学术贡献。同时,他身上也浓缩了那一代身在苏联并极具创造性的德裔学者的学术生活境遇。

关键词 施穆科勒 MEGA¹ 梁赞诺夫

〔土〕康加恩,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哲学系讲师 210023

徐家熠,南京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 210023

卡尔·施穆科勒(1898–1938)是一位此前并未受到太多关注的德国马克思主义学者^[1]。他的身份包括德国共产党党员、文学评论家、哲学家、语言学家以及马克思早期著作研究专家。同时,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版)》(简称 MEGA¹)的编辑者之一,他曾在大卫·梁赞诺夫的监督和管理下从事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的编辑和研究工作。MEGA¹ 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梁赞诺夫个人的首创精神和他与西欧学界的广泛联系。许多合作基本都是通过梁赞诺夫才得以达成,例如与此后建立的法兰克福社会学研究所和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的合作,以及与德国共产党内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联系等。梁赞诺夫的工作也是卡尔·施穆科勒去往莫斯科的原因。彼时施穆科勒是一位年轻的哲学学者,他自诩为共产主义者和艺术评论家。在梁赞诺夫的请求以及法兰克福社会学研究所的正式建议下,德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将许多杰出的德国学者送往莫斯科,在马恩研究所展开工作。施穆科勒就是其中之一。

[1]为数不多的研究参见缪勒和施莱尔的著作。参见 Müller, Reinhard 1991, *Die Säuberung. Moskau 1936. Stenogramm einer geschlossenen Parteisammlung*, Hamburg: Taschenbuch; Schleier, Hans 1982, “Karl Schmückles Auseinandersetzung mit dem bürgerlichen deutschen Historismus”, *Jahrbuch für Geschichte*: 25, pp.305–340.

施穆科勒的前莫斯科生涯

对施穆科勒的政治目标起到重大影响的事件大概有两个。第一个是：他在一战中受重伤，并被送往德累斯顿；在这里，施穆科勒第一次接触到共产主义者的世界观。在他伤愈之后，他被送往乌尔姆。当时，乌尔姆是德国仅次于波茨坦的第二大要塞城市。在这里，施穆科勒作为红军士兵的一员参与了十一月革命(November Revolution)。1919年，他前往图宾根学习哲学和神学。在那里，他和费历克斯·韦尔(Felix Weil)、海因里希·苏克德(Heinrich Süßkind)两人一起合作创建了学生社会主义者的自由联合会。此后，费历克斯·韦尔在1923年创立了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而海因里希·苏克德则是《红旗报》(Rote Fahne)的主编。学生联合会曾邀请了诸如克拉拉·蔡特金、威廉·缪齐伯格(Willi Münzenberg)和埃德温·赫恩雷(Edwin Hoernle)等等演讲者。学生们还组织了一些政治哲学讲座，而这直接引发了决定施穆科勒的政治意识形态路线的第二个关键事件。

在克拉拉·蔡特金的建议下，施穆科勒前往柏林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在那里参加了许多社会民主主义教授的讲座，如海恩里希·库诺夫(Heinrich Cunow)、英格涅·加斯特罗(Ignaz Jastrow)、保尔·连施(Paul Lensch)、埃米尔·维·赫斯(Emil VerHees)和维尔纳·桑巴特等。此外，施穆科勒还参加了古斯塔夫·迈耶尔(Gustav Mayer)组织的一个研究马恩早期著作的研讨班。古斯塔夫·迈耶尔是最早一批研究德国工人历史的史学家之一。1921年，施穆科勒转到耶拿大学学习。这所大学曾以德国唯心主义闻名，此后又以数理逻辑学著称。在这里，他参加了格哈德·科施勒(Gerhard Kessler)和卡尔·柯尔施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讲座。1923年，施穆科勒参与了由费历克斯·韦尔资助、理查德·佐尔格(Richard Sorge)组织的项目：第一届马克思主义学术讨论周。参与这个项目的人还包括：贝拉·普罗加希(Bela Fogarasi)、玛格丽特·丽莎尔(Margarete Lissauer)、格奥尔格·卢卡奇、弗里德里希·波洛克(Friedrich Pollock)、康斯坦丁·蔡特金(Konstantin Zetkin)、卡尔·柯尔施、克里斯提娜·佐尔格(Christiane Sorge)、凯瑟·维利(Käthe Weil)、福本和夫(Fukumoto Kazuo)等等。列入讨论日程的议题包括：危机问题、方法论问题、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组织问题以及卡尔·柯尔施尚未发表的手稿《马克思主义与哲学》^[1]。然而，无法期待这个学术团体再举行第二次会议。因为，像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这样一些更有雄心壮志的组织逐渐建立起来。在卡尔·格律恩贝格的领导下，这个研究所开始与莫斯科的苏联马恩研究所紧密联系起来。

施穆科勒在1923年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论文由弗朗兹·古特曼(Franz Gutmann)、格哈德·凯斯勒(Gerhard Kessler)和奥托·克尔罗伊特(Otto Koellreutter)做鉴定人。他们所提的问题涉及国家经济、财政、货币系统和政治学理论。施穆科勒考虑到在这场最终考验中可能遭遇的主题，于是选择了一个非常激进的论文题目：乌托邦的逻辑-历史因素。在其中，施穆科勒探讨了乌托邦的两个起源，一是十七世纪莫尔、康帕内拉、马布里(Mably)、摩莱里(Morelly)和梅叶(Meslier)等人，另一个是十九世纪圣西门和傅立叶^[2]。施穆科勒博士阶段的研究影响了他此后的整个学术生涯。完成博士论文后，他致力于研究从马基雅维利到黑格尔的国家和社会理论，以及青年马克思的早期世界观。在法兰克福研究所，他研究的主题是资产阶级国家理论的历史发展。作为成果，一篇关于霍布斯的论文1930年发表在俄文版《马克思恩格斯文库》(Marx-Engels-Archiv)上。此后，施穆科勒关于青年马克思和资产阶级

[1] Jay, Martin 1973, *The Dialectical Imagination. A History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and the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1923-1950*, London: Heinemann, p.5.

[2] Schmückle, Karl 2014, "Logisch-historische Elemente der Utopie", in *Karl Schmückle: Begegnungen mit Don Quijote. Ausgewählte Schriften*, edited by Werner Röhr, Hamburg: Argument.

社会的研究工作也同样致力于从后期马克思的视角出发来阐释马克思乌托邦思想的根源。

1923至1925年间,施穆科勒承担了多家共产主义报刊的编辑工作,例如《自由报》(Freiheit)、《贝尔吉施人民之声》(Bergische Volksstimme)、《工人日报》(Arbeiter-Zeitung)、《红旗报》。1924年,德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期刊《共产国际》(Die Internationale)发表了施穆科勒写作的一篇评论文章。这篇文章针对的是德波林的《战斗唯物主义者列宁》^[1]。德波林在这本小册子里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列宁1908年的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在当时这部著作尚未享有太广泛的知名度。施穆科勒对德波林的哲学取向给予肯定性的评价。借此,他也表达了对德共内部一些理论趋向的批判以及对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倾向的批判。当时,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哲学和理论问题持轻视态度。施穆科勒在这篇文章中强调了德波林对于列宁主义的贡献。他认为,德波林的理论研究对于从辩证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出发来理解哲学的基本问题,如物质、意识、实践、空间、时间等,有很大裨益^[2]。

施穆科勒和MEGA¹

1925年,在大卫·梁赞诺夫的请求和法兰克福研究所的正式提议之下,德共领导人决定派遣施穆科勒前往莫斯科的马恩研究所。施穆科勒在同年到达苏联,并在次年加入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在大卫·梁赞诺夫的领导下,研究所计划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早期阶段开始的全部著作。得益于此前关于乌托邦以及马克思早期著作的研究,施穆科勒自然成为了这个项目的不二人选。

梁赞诺夫于1917年回到俄罗斯,随后他就加入了布尔什维克。1918至1920年间,他活跃于工会和其他政治组织中,在建立和指导国家档案馆方面他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直到1930年,他都担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正式成员。1918年,他曾提出一个提案,要求建立一个社会主义者的研究机构,将全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联合起来。这个机构的中央领导者包括:伯克洛夫斯基(покровский)、斯科拉科夫-斯捷潘诺夫(скворцов-степанов)、卢纳查尔斯基(Луначарский)、波格丹诺夫、布哈林、德波林、梁赞诺夫^[3]。1920年,苏俄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决定建立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由六个部分组成:科研部门、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展览馆和财务管理处^[4]。1924年召开的共产国际五大表达了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的迫切愿望。最终,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建立起来并正式启动MEGA编撰项目^[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GA¹)计划分42卷出版,全部采用原文且不加删减。项目分成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预计出17卷,涵盖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部的哲学、经济学(除《资本论》外)、历史学和政治学著作。第二部分由《资本论》以及与此相关联的一系列经济学手稿组成。第三部分是马克思恩格斯的通信。第四部分则是对全部人名和主题的索引^[6]。由于有着充足的资金来源,以及梁赞诺夫广泛的国际关系,研究会得以吸引了一大批杰出的马克思研究的学者,如贝卡洛夫(Бакалов)、崔贝尔

[1]Deborin, Avram 1924, "Lenin – voinstvujuščij materialist", *Pod Znameniem Marksizma*: 1, pp.10–28.

[2]Schmückle, Karl 2014, p.89.

[3]Rokitanskij, Jakov 1993(1992), "Das tragische Schicksal von David Borisovic Rjazanov" in *Beiträge zur Marx-Engels-Forschung Neue Folge 1993. Marx-Engels-Forschung im historischen Spannungsfeld*, edited by Carl-Erich Vollgraf, Richard Sperl, and Rolf Hecker, Hamburg: Argument, p.4.

[4]Schiller, Franz 1930, "Das Marx-Engels-Institut in Moskau", *Archiv für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und der Arbeiterbewegung*, Fünftehnter Jahrgang, p.420.

[5]Schmückle, Karl 2014, p.125.

[6]Rjazanov, David B. 2007(1927), "Vorwort zur MEGA 1927", *UTOPIE kreativ*: 206, pp.1107–9.

(Czóbel)、德波林、福克斯(Фокс)、豪伊杜(P. Hajdu)、考斯文(Косьен)、昆(Кун)、卢卡奇、鲁宾(Рубин)、斯登(Стен)、斯特恩(Стерн)、维尔(Веллер)等等。当然,施穆科勒也包括在其中^[1]。

在梁赞诺夫的管理下,研究所出版了第一部分的三卷,分别是:1927年的卷I/1.1、1929年的卷I/1.2、1930年的卷I/2,内容主要是马克思1844年以前的著作,包括信件和文件等。还出版了第三部分的三卷,分别是:1929年的卷III/1、1930年的卷III/2、1930年的卷III/3,内容主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4—1853年间、1854—1860年间以及1861—1867年间的合著。在此期间,研究所还为第一部分的四卷和第三部分的一卷做了准备,前者包括1932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收录于卷I/5(1932);马克思和恩格斯从1846年2月起至1848年5月期间的著作,收录于卷I/6(1932);恩格斯自1844年至1846年间的著作、《神圣家族》以及马克思在1844—1845年间的著作,收录于I/3(1932)。后者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68年至1883年间的合作,收录于卷III/4(1931)。这几卷在梁赞诺夫卸任后出版——此后阿多拉茨基(Адоратский)接替了他的位置。施穆科勒作为编辑或撰稿人,名列于卷I/1.1、I/1.2和III/3之中。卷I/3、I/5和III/4中虽然没有提到他的名字,但实际上他也是撰稿人之一。除了在MEGA编辑组中的编辑身份以外,施穆科勒还翻译了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1929)^[2]一书以及十八卷本的列宁全集的德文第一版。此外,施穆科勒还写作了一些文章,内容主要是对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以及莫尔、马基雅维利、霍布斯等的理解。

与弗兰茨·梅林的四卷版本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不同,MEGA¹版着眼于青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部作品,包括已出版的和未出版的,力求全面且精确。举例而言,马克思为他的博士论文准备的七个笔记本,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所作的准备性手稿,这些文献在梅林版中都被略去了,而在MEGA¹中却被原原本本地呈现出来了。在MEGA¹第一卷的序言中,梁赞诺夫特别强调了梅林在编撰过程中的删节和修正方式是极容易引起歧义的。他举例说,梅林在修订《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相关材料时完全删去了圣麦克斯一章,而这仅仅是因为他认为这一章“并不重要”。梁赞诺夫认为,这种对文本的改动遮蔽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发展的重要转变关节点,即从费尔巴哈人本主义转向科学社会主义过程中的关键环节。虽然梅林对材料进行了缩减,修正了许多表达,但是这种编辑方式也同样去除了原文中的引用符号、斜体和黑体字,但他本人却认为这种文本编辑是必要的^[3]。当时与梅林合作的迪茨(Dietz)出版社同样也存在很多问题。一方面,对迪茨出版社来说,没有必要重新出版市场上已有的一些材料;另一方面,从法律角度来说,有些文章涉及敏感问题,因而也不能被囊括其中,例如1849年的《霍亨索伦王朝的总改革计划》就有可能被控告为侮辱政府官员^[4]。

当时,距梅林版出版后已过了二十年。在这期间,新的手稿、笔记、已出版的文章也在档案馆、图书馆等地被陆续发现。因而,梅林版的收录就不再是完整的了。对于伯恩施坦编辑的马恩通信集,梁赞诺夫同样持有许多批评意见。伯恩施坦随意地摘取他认为最重要的马恩的语录,而对他看不顺眼的部分则任意地删减^[5]。而梁赞诺夫却相反,他希望避免梅林和伯恩施坦版本中的武断性,使得

[1]Hecker, Rolf 1994, *Beiträge zur Marx-Engels-Forschung. Neue Folge 1994. Quellen und Grenzen von Marx' Wissenschaftsverständnis*, edited by Carl-Erich Vollgraf, Richard Sperl, and Rolf Hecker, Hamburg: Argument, p.150.

[2]已出版完整著作中此文的版本参见 Plechanov, G. V. 1957, *Osnovnye Voprosy Marksizma in Izbrannye Filosofskie Proizvedeniya* Volume 5, Moskva: Gosudarstvennoe Izdatel'stvo Politicheskoi Literatury.

[3]参见 Mehring, Franz 1923, *Vorwort des Herausgebers in Aus dem literarischen Nachlass von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 1841 bis 1850. Erster Band. Von März 1841 bis März 1844*, edited by Franz Mehring, Berlin: Dietz. pp.vii-ix.

[4]Rjazanov, David B. 2007(1927), "Vorwort zur MEGA 1927", *UTOPIE kreativ*: 206, pp.1101-3.

[5]Langkau, Götz 1983, "Marx-Gesamtausgabe-Dringendes Parteiinteresse oder dekorativer Zweck Ein Wiener Editionsplan zum 30. Todestag, Briefe und Briefauszüg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28, p.120.

MEGA¹成为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原初文本的最精确、最可靠的资源^[1]。

1927年,施穆科勒在《红旗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MEGA¹第一卷的评论文章。1933年,在《国际文学》(Internationale Literatur)上,施穆科勒也发表了一篇题为《青年马克思与资产阶级社会》(Der junge Marx und die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的文章。这两篇文章指出,文本的精确性不仅能够使我们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转向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过程有一个更好的理解,而且能够防止来自当代资产阶级阵营的反马克思主义批评者对马克思进行的歪曲和篡改。在这里,施穆科勒显然针对的是:奥托·鲍威尔、亚瑟·罗森贝格(Arthur Rosenberg)、西格弗里德·兰茨胡特(Siegfried Landshut)、雅各布·梅耶尔(Jacob Mayer)以及亨里克·德曼(Hendrik de Man)。他认为,这些人把马克思和恩格斯歪曲成自由主义倾向的机会主义者、资产阶级内部的革命家^[2]。资产阶级出于反社会主义目的,总是试图去利用马恩早期发展中的黑格尔主义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思想资源。在施穆科勒看来,正是MEGA¹的编辑出版工作使得这种努力成为不可能。事实上,MEGA¹第一卷的目的恰恰在于用文本来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发展的科学历程。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向着一个更为成熟的阶段的蜕变过程需要更为深入的探讨。而这正是施穆科勒试图在他的文章里阐明的^[3]。

MEGA¹之后的施穆科勒

1931年2月,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OGPU)对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进行了突击搜查,在一周左右的时间里搜查了所有的房间、档案室、图书馆、手稿、印刷材料,并且审问了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原因是:研究所里有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名叫伊萨克·鲁宾(Исаак Ильич Рубин)^[4],他曾是犹太工人总同盟的支持者,并且是孟什维克的成员。他曾将孟什维克的一批文件交给了梁赞诺夫。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官员找的正是这批文件。1930年12月,鲁宾就曾因加入孟什维克“反革命组织”而被捕,并于1931年3月被送进监狱^[5]。在审问过程中,鲁宾透露出梁赞诺夫也与孟什维克有所牵连。研究所因此被关闭,梁赞诺夫也被迫从管理职位上卸任,并被放逐到萨拉托夫(Saratov)^[6]。不过,梁赞诺夫否认了所有的指控,并在庭审过程中坚称自己是无辜的^[7]。

1931年2月,阿多拉茨基接替了梁赞诺夫的位置。党中央组织了一个委员会,以改组研究所。委员会的成员包括:托夫图哈(Товстуха)、克留科夫(Аранов)、克雷普斯(Крепс)、科斯洛夫(Кослов)、伊凡洛夫(Иванов)等。他们被指派来评估此前研究所的243个成员,写出报告,并投票决定如何处理其中109个非党员和22个党员。其中一份报告称,施穆科勒“如果对研究所具有强大的领导力,那么将非常有用”。再举一个例子,卢卡奇在当时被称为一个“真诚的、忠实的工作者”。但从他的“哲学观

[1][2]Schmückle, Karl 2014, p.127, p.150.

[3]Schmückle, Karl 2014, “Der junge Marx and die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4]托洛斯基对此的评论参见Trotsky, Lev D. 2013(1931), “A New Slander Against D. B. Riazanov”, <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trotsky/1931/xx/riazanov.htm>.

[5]Vasina, Ljudmila 1994, “I. I. Rubin – Marxforscher und Politökonom” in *Beiträge zur Marx–Engels–Forschung Neue Folge 1994. Quellen und Grenzen von Marx’ Wissenschaftsverständnis*, edited by Carl–Erich Vollgraf, Richard Sperl, and Rolf Hecker, Hamburg: Argument, p.149.

[6]Burkhard, Bud 1985, “D. B. Rjazanov and the Marx–Engels Institute: Notes toward Further Research”, *Studies in Soviet Thought*: 30–1, p.46. Rokitsanskij, Jakov 1993(1992), p.12.

[7]Rjazanov, David B. 1995, “Moe pokazanie. Nr. 1. 18 Fevralja 1932” in G. D. Golovina and J. G. Rokitsanskij, “«Ja ne soveršal nikakogo prestuplenija». Dve saratovskie rukopisi akademika D. B. Rjazanova. 1932–1934 gg.”, *Istoričeskij Archiv*: 2, pp.201–221.

点看,(卢卡奇)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这场清洗中,几乎所有杰出的学者都离开了研究所。因此,瓦迪斯瓦夫·赫德勒(Wladislaw Hedeler)应邀草拟一份新的候选学者名单。尽管如此,研究所以及MEGA'的编撰工作本身还是得到了延续,直到1930年代后期第二波清洗浪潮的再度袭来,也就是著名的莫斯科公审(Московские процессы)。

1931年,施穆科勒从研究所除名之后不久,他就开始在各大政治和文学报刊工作。1931到1934年间,他为《德意志中央日报》(Deutsche Zentral-Zeitung)工作;1934-1938年间,他为双月刊《世界文学》工作。在马克思逝世50周年纪念之时,施穆科勒关于青年马克思和资产阶级社会的文章被《世界文学》刊印发行。1932年,施穆科勒加入了国际革命作家联合会(Internationaler Verein Revolutionärer Schriftsteller)德国分会。作为编辑他参与了联合会的合作项目,而合作对象就是以莫斯科为基地的出版社。该项目出版了罗莎·卢森堡、卡尔·李卜克内西以及克拉拉·蔡特金的著作。1936年创办的杂志《语词》(Das Wort)也将施穆科勒列为撰稿人之一,但并没有出版他的任何作品。此时在西欧,法西斯主义正逐渐兴起。因此,施穆科勒开始活跃于新成立的人民阵线联盟。它是国际革命作家联合会的下属组织,目的是联合世界范围内的反法西斯主义作家,并引导莫斯科方面与恩斯特·布洛赫、马克斯·布罗德(Max Brod)、利翁·福伊希特万格(Lion Feuchtwanger)、奥斯卡·玛利亚·格拉芙(Oskar Maria Graf)、阿尔弗雷德·康托洛维奇(Alfred Kantorowich)、托马斯·曼、古斯塔夫·雷格勒(Gustav Regler)、威兰德·赫茨菲尔德(Wieland Herzfelde)等人的沟通交流。

《世界文学》上有两篇施穆科勒的文章值得瞩目^[1]。它们发表于1936年,内容是关于塞万提斯的小说《堂吉珂德》的。这部小说非常出名。但是塞万提斯在政治上的重要性直到近期才显现出来。这主要是因为塞万提斯在1932年遭到了西班牙的法西斯主义诗人安尼斯托·卡贝罗(Ernesto Jiménez Caballero)的攻击。卡贝罗宣称,塞万提斯的小说包含着一些元素,这些元素与早期启蒙运动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在1936年的弗朗哥政变之后,反对塞万提斯的倒退倾向和诽谤攻击就开始大规模的兴起了。施穆科勒肯定了塞万提斯的小说《堂吉珂德》的重要性。他认为,这部作品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反映了当代西班牙国内阶级对立状况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也不仅仅在于它被法西斯主义者用来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而且更重要的是,可以从中发现幻想与现实的诙谐辩证法与资本主义社会的颠倒和倒置之间有着隐秘的联系。而资本主义社会的颠倒和倒置,正是社会乌托邦主义者和马克思本人都曾经批判过的^[2]。

晚年不幸经历

自1930年代开始,“托洛斯基-季诺维也夫主义反革命分子集团”就成为了苏联领导人的重要威胁。在1934年,这个集团被控告试图暗杀斯大林以及其他苏联领导人。在正式审判前的证词和坦白中,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证实,自1932年开始,党内的反对派就被组织起来了^[3]。在供词中坦白与托洛斯基分子的阴谋有关联的,大部分都是领导干部。自从1937年图哈切夫斯基的武装叛乱被揭发以来,党内的领导就迅速转变战略,积极打击一切与托洛斯基分子集团、反苏联阴谋集团有所牵连的人。此前被宣告有罪的那些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的成员都被审问。当局详细调查了与他们的身份有牵连者的私人或职业上的往来关系以及他们的意识形态观点。卡尔·施穆科勒就是

[1]Schmückle, Karl 2014, “Der aktuelle Don Quichote”, “Begegnungen mit Don Quichote”.

[2]Schmückle, Karl 2014, p.284.

[3]Getty, J. Arch 1987, *Origins of the Great Purges. The Soviet Communist Party Reconsidered, 1933-1938*,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122.

被调查的对象之一。

当时在媒体阵线,也开展了大规模的针对反苏联阴谋集团的活动。受此影响,1936年8月27日,《文学公报》(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газета)首先宣称施穆科勒是一个托洛斯基派分子。此后两天,《德意志中央日报》也宣称他是一个叛徒。在匈牙利作家亚历山大·鲍尔托(Alexandra Barta)的主持下,18位作家以及3位政府官员于1936年9月4日至9日举行了一个党内会议,目的是侦查出党内的敌人,主要包括苏联科学界、哲学界和文学界的托洛斯基分子和“左倾”分子。参会的成员有:米歇尔·阿尔派丁(Michael Alpetin)、朱丽叶·安年柯夫(Юлия Анненкова)、约翰森·贝彻(Johannes Becher)、维利·卜雷德(Willi Bredel)、艾玛·东伯格(Emma Dornberger)、恩斯特·法拉比(Ernst Fabri)、安道尔·佳博(Andor Gábor)、汉斯·君特尔(Hans Günther)、胡果·于佩尔(Hugo Huppert)、皮特·卡斯特(Peter Kast)、阿尔弗雷德·库瑞拉(Alfred Kurella)、格奥尔格·卢卡奇、海因里希·梅耶尔(Heinrich Meyer)、恩斯特·沃特华德(Ernst Ottwalt)、古斯塔夫·雷格勒(Gustav Regler)、古斯塔夫·冯·万根海姆(Gustav von Wangenheim)、埃里奇·温内尔(Erich Weiner)、弗里德里希·沃尔夫(Friedrich Wolf)、海因里希·维埃茨克(Heinrich Wiattrek)。

这些成员中,安年柯夫(Анненкова)和法夫里(Fabri)曾和施穆科勒一起在《德意志中央日报》工作,比彻(Becher)则是他在《世界文学》任编辑时的亲密同事之一,布雷德尔(Bredel)也从《语词》杂志上对他有所了解。布雷德尔曾抱怨施穆科勒和他的合作者掩盖了他的权威,他也曾责备施穆科勒忽视他的位置。相反,比彻、安年柯夫和法夫里则对施穆科勒的工作成果大为赞赏。此外,格奥尔格·卢卡奇则宣称施穆科勒是“党的敌人”,是一个“反革命分子”,卢卡奇说施穆科勒将他自己隐藏在“忠诚于党的面具”的背后。卢卡奇为施穆科勒的清算投了一票,并且建议进一步调查他的私人关系。君特尔的证言也表示,施穆科勒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并且是一个隐藏的敌人,他是海因里希·苏克德的亲密朋友。而海因里希在前不久的1936年8月9日刚被国际事务人民委员会(NKVD)逮捕。于佩尔(Huppert)则断言施穆科勒对党的抱有敌意。最终,NKVD所谓的德国行动还是把施穆科勒囊括在内。他于1937年11月30日被逮捕,罪名是间谍罪。1938年3月14日,他被处死。在1936年-1943年间,君特尔、沃特华德、鲍尔托、梅耶尔、安年柯夫等人也相继遭到逮捕,这都是同一个调查案的结果。从前在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里与施穆科勒共事的俄国同事们则被另案处理。鲁宾于1937年11月21日在哈萨克斯坦被处死,梁赞诺夫则于1938年1月21日在俄罗斯萨拉托夫被处死^[1]。

1950年代后期,莫斯科军事法庭才给卡尔·施穆科勒和其他一些与他情况类似的人平反。卡尔·施穆科勒是1930年代大清洗运动的受害者之一,他的命运也同样昭示了前苏联其他许多知识分子的命运。施穆科勒的工作成果不仅证明了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伟大贡献,代表了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上德国和苏联早期的国际合作,而且为我们当代的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做出了价值巨大的贡献。今天我们深化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回顾20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施穆科勒都将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研究对象。

〔责任编辑:曾逸文〕

[1]Vasina, Ljudmila 1994, "I. I. Rubin – Marxforscher und Politökonom" in *Beiträge zur Marx-Engels-Forschung Neue Folge* 1994. *Quellen und Grenzen von Marx' Wissenschaftsverständnis*, edited by Carl-Erich Vollgraf, Richard Sperl, and Rolf Hecker, Hamburg: Argument, p.149. Rokitsanskij, Jakov 1993(1992), p.15.